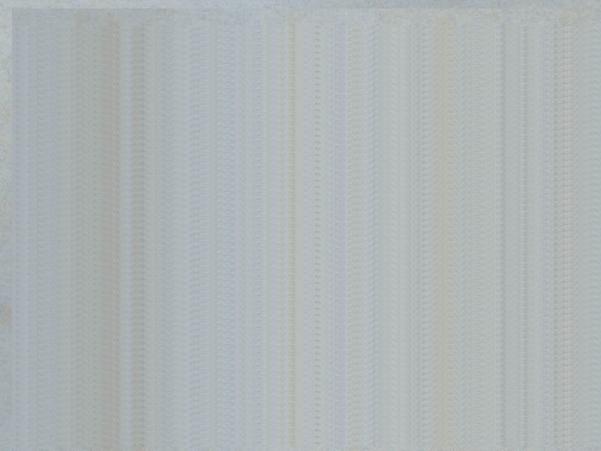


中国现代革命史
学习参考资料

第三辑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山大学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室编

中國現代革命史學習參攷資料

第三輯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 目 錄 —

讀“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李 琦	1
——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 的兩條路線		
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陳伯達	14
毛泽东同志與陳獨秀機會主義分子的 根本分歧	黎 澈	44
——關於“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 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紀念斯大林同志的“中國革命問題” 的廿五周年	陳伯達	55
介紹斯大林全集第九卷關於中國革命 問題的著作	繆楚黃	66
中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與 英帝国主义	苏联 M·維亞特金	77



—附錄—

国民党底分析 陈潭秋 102

西山会议派——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一小撮反革命分子 荣孟源 96

一九二四年的广东商团叛乱 丁名楠 104

五卅运动中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概况 张玮瑛 114

五卅运动中苏联和全世界工人阶级对
我国的援助 王忠 125

美帝国主义在五卅运动时的侵华毒计 沈白敏 128

省港大罢工对香港经济上的打击 丁名楠 137

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反军阀斗争 來新夏 145

“四一二”前后美蒋的勾结过程 刘桂五 153

“四一二”政变后两年中上海工人的斗争 蓝鸣軒 157
——从一种反动统计资料中所看到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丁名楠 165

苏联人民怎样支持1924—1927年
的中国革命 苏联貝契科夫 175

五卅运动中的上海总商会 钱宏 180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勾结破坏武
汉革命中心的经过 沈白敏 186

—— 讀「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李琪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的兩條路線

(一)

毛澤東同志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獻。它是毛澤東同志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革命第一個緊要關頭中所寫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偉大著作之一。

毛澤東同志這一著作，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國農民」和同年三月「中國青年」雜誌上，是为了反對當時黨內存在的兩種傾向——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和以張國焘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特別是為了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而寫的。

當時中國正处在北伐戰爭的前夜，革命運動發展形勢的特點是：自从一九二四年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合作以後，在中共領導下，在第三國際和蘇聯幫助下，中國革命運動已獲得重大發展。首先是廣州革命政府依靠共產黨員、共產主義青年團員以及革命群眾的支持，至一九二五年底，已將廣東全省解放。廣東全省的統一與革命武裝力量的壯大，使南方革命根據地巩固起來，奠定了以後北伐的基礎。其次，群眾運動——特別是工人運動這時正在猛烈發展。一九二五年有名的五卅運動，標誌着全國工人運動新的高潮的到來。全國各大城市里，到處不斷發生着反對帝國主義的遊行、示威、罷工、罷課的鬥爭；在廣大農村里，也正醞釀着和發展着大規模的農民運動。一九二四年冬，毛澤東同志回湖南有計劃地組織農民並領導他們進行鬥爭。在他的努力下，幾個月之中，即組織起二十多個農民協會，建立起後來湖南伟大農民運動的核心。一九二五年，毛澤東同志到廣州。以後，他就主持

了广东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努力训练由全国各地来的从事农民运动的干部。由于形势的发展，该所的许多学员没有等到毕业，即分配到各地领导农民斗争，因而农民运动至一九二六年春，也有了重大开展。与以上革命力量如此日益发展和扩大同时，反革命势力对于革命运动的破坏和镇压也更加紧，到处屠杀、逮捕革命群众。这样，全国各地都展开着革命与反革命的猛烈斗争，显示着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已到了大决战的前夜，这是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和发展，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国民党右派，亦日益暴露出其反革命的本质。他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右派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夺革命的领导权，坚决反苏反共，反对那些主张实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分子，企图篡军、篡党（国民党）、篡政、绞杀革命以达到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的目的。就在这一可耻阴谋下，反动派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刺死了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

廖仲愷，以打击左派势力。他们在理论上思想上的旗帜，就是所谓「戴季陶主义」。戴季陶曾写有「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左派、反对工农运动、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要求把当时各革命阶级联盟的国民党改变成为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党，并由这样的政党来把革命群众的斗争引去达到建立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的反革命目的。因而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起，在国民党内就已开展着这种反动的「戴季陶主义」的运动，并在这一运动下，于是年十一月间形成了「西山会议派」。一部分反动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中山灵前开会，公开叫嚣反苏反共，以与在广东的蒋介石、胡汉民等反动派相呼应，阴谋策划反革命的政变。大家知道，就在毛泽东同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后不久，即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等反动派，在广东即发动了

第一次的反苏反共政变——所谓「中山舰事件」。所以当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的时候，又正是革命阵营中，反动派对革命派、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阴谋诡计以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达到很紧张程度的时候。这种革命阵营中的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尖锐斗争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之日益分化，就成为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特点的另一方面。

(二)

由于上述形势的迅速发展，到一九二六年初时，各方面都充分显示着中国革命已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头。为了使党在这一革命运动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正确地解决有关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根本问题，这就是革命领导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实质则是农民问题。因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如果不由工人阶级领导，就不能胜利；而工人阶级如果不与占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广大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领导农民劳动群众起来斗争，那末，所谓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因而农民问题就成为决定中国共产党策略路线时一个根本的问题。

然而，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等，却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分子，在他们的领导下，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一九二五年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两个根本问题：领导权和农民问题，都未能获得正确的解决。相反的，陈独秀等对这两个根本问题，却给了完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回答。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一九二三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后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这次大会期间，他连续发表过两篇文章「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他在这两篇文章中所表现的错误观点，成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党内孟什维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

我们且看陈独秀在这两篇文章中对这两个根本问题是怎样的解决的，看他是怎样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并怎样规定党的策略路线的。

首先，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因为中国工人阶级比中国资产阶级还幼稚；甚至在当时还是一个有觉悟的阶级。他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主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来说，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理想，略分三类：第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有许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而他过去未来的生活，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小手艺、小商人、小农等）的环境绝缘，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神权、帝王之迷信……工人阶级的理想犹是宗法社会的而非国家的……。第二、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只在最进步的海员及铁路工人罢工中才表现出来……，第三、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的阶级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斗争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这就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孟什维主义者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看法。这是多么悲观的论调！难怪乎陈独秀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他主持干脆取消共产党，「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并埋怨中共早生了五年！他完全不了解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不了解这一阶级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辟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时代里在中国所担负的历史任

务。他至部抄袭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旧民主主义观点，来看待二十世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中国工人阶级，说什么「中国的经济现状，军阀阶级已与资产阶级显然分开，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既然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发展成为独立的阶级，因而他在革命实践中，不依靠工人阶级，放弃工人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

工人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那末农民阶级又是怎样呢？农民在陈独秀眼中，更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宗法迷信思想、保守落后、畏难苟安。他说：「农民佔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但是，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畏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在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动力的分析中，始终是不包括农民在内的。他认为革命统一战线中，就只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农民是不在这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之内的，更不要说把广大农民看成是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了。不了解农民是中国革命中的伟大力量，轻视农民问题的严重意义，不把农民问题以及解放农民的土地问题看作是决定党的策略路线时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是中国革命中，右的和「左」的一切机会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分水岭。

工人农民都不行，剩下的就只有资产阶级了，陈独秀正就是这样认识的。他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同上）又说：「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阶级的基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所以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正轨」应当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同上）这就是陈独秀孟什维主义的公式！在这一公式中，包含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全部的实质，这就是：不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把农民一脚踢开，拜倒于资产阶级的膝下，认不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这一切，就构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孟什维主义的策略理论的基础。

(三)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与陈独秀为代表的孟什维主义策略路线相对立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路线。这条路线与上述路线完全不同，它是真正的革命路线，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大家知道，远在十月革命前，列宁、斯大林就提出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一般纲领，规定了工人阶级政党在这些国家里革命中的基本路线。十月革命的胜利，唤醒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觉悟，每个民族都卷入到反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浪潮中来，正如列宁一九一九年在东方人民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东方人民睡醒了，他们要实际行动起来，每个民族都要解决关于全人类命运的问题了。」因此，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第三国际，从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之日起，就特别注意东方名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尤其对中国命运的发展更为关怀，这时，列宁、斯大林根据革命形势的新的要求，更具体地规定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人阶级政党革命的任务和纲领，其中对中国革命并有过许多具体的决议和指示，尤其斯大林同志在这一时期中，对中国问题的很多专门研究和著作，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中更具有着至大意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就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

些理论作为自己斗争的武器的，在斗争中把它具体化，使它与中国革命具体环境和具体斗争相结合，并从而发展了它、丰富了它。因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布尔什维克，从陈独秀等错误倾向一产生之日起，就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

众所周知，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由于以列宁、斯大林为首的第三国际的直接指示和帮助，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在大会上坚持了正确的意见——一方面，反对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联合国民党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另方面，又反对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不应当与国民党联合，只有工人才能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才使大会通过了既与国民党联合、又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的方针，这是完全正确的。但陈独秀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并没有接受大会的批评，以改正自己的错误观点。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的错误倾向也就日益发展起来，特别到了一九二五

二六年时，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全国已处在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前夜，而在革命阵营中，反革命与革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也达到了很紧张的程度，因而他的错误倾向对党的危害性也就越来越显示出来，发展下去，势必使党在未来事变中失去处置事变的能力，失去党对广大工农群众革命斗争的领导作用；另方面，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口头上虽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但却同样地否认农民在革命中的重大作用，不去发动农民进行斗争，结果在实际上还是取消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这两种倾向的发展，都会使党在未来决战中遭受严重失败。为了反对这两种倾向，为了给党的行动路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明，从而把党的斗争策略建立在巩固的布尔什维主义思想基础上，从理论上来说明这些问题，依靠这种科学分析进而指导正在发展中的革命，就成为当时迫切的头等的政治任务了。

然而，在当时条件下，要完成这一任务，却是一件艰巨的工作，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这时成立还不久，整个党尚处在幼年时代的缘故。这一历史情况，就是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一至四次）还未对领导权和农民问题给以很好的解决，因而在党的整个策略路线上就还存在着严重缺点的客观原因；同时也就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还能够在党内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原因。然而，正是在这样困难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却光荣地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于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间发表了他的伟大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这一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充分表现了自己的革命智慧，表明了他已是一位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学者，是中国最杰出的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表明了他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巨匠和能手。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这一著作中，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阶级斗争论与阶级分析法，在中国第一次全面地具体地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特点、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趋势，正确地解决了历次代表大会所没有解决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领导权和农民问题，坚决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从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基础。因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而且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伟大文献。

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著作中，首先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认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了革命能够胜利，不再走错路子，「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同上）

这就是说，必须首先正确地解决革命的任务、动力、领导等根本问题，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而正是在这些有关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的解决上，陈独秀和张国焘们都陷入到机会主义的泥坑。

接着毛泽东同志就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具体地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同上）这样毛泽东同志不仅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且也就揭露了当时隐藏在革命阵营中与帝国主义进行勾结、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反动派的社会阶级基础。

那末这个革命应由谁来领导呢？——这是有关中国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也是党历次大会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坚决反对陈独秀的以及资产阶级代言人——戴季陶主义者所倡导的，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错误的反动的观点，而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我们「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同上）。中国民主革命必须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胜利的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同时也是毛泽东同志的策略思想与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

有领导必须要有被领导。什么阶级应成为工人阶级最主要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这是解决领导权最本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党历次代表大会所没有解决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是工人阶级应该领导的最雄厚的革命的社会力量。他说：「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同上）特别是广大的农民，他们「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同上）。他们「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雨，向亲友乞哀告憐，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

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同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同盟军问题。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已明确地具有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联合农民，要联合农民，必须实行急进的土地政策以解放农民这一伟大的思想。而在这方面，也正是毛泽东思想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根本不同的地方。陈独秀和张国焘都否认农民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广大的同盟军，都不承认工农联盟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因而陷入到机会主义的泥坑。

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是怎样呢？毛泽东同志指出：它是一个动摇不定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因而它不仅不能领导革命，而且我们还得要时时警惕它。他说：「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琪注），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认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同上）一九二七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毛泽东同志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一科学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总起来说：中国革命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与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结成巩固联盟，联合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但要时刻防止其反动性，组成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实行向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攻击，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所阐发的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主义策略的基本思想。同时，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与一切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相对立的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的正确的斗争路线。

当然，毛泽东同志这一伟大著作的历史意义，还不仅在于它正确地规定了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正确路线，给了党一个明确而坚定的行动纲领，而且还在乎：它在反对陈独秀和张

国焘为代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斗争中，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全部民主革命以及将来社会主义革命中整个策略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他说：「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

(同上)他从中国和世界革命这一历史特点出发，断言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实现自己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同上)。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发展前途的这一科学论断，给了「戴季陶主义」运动以坚决回击。在当时中国来说，这实是一个杰出的英明创见，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的正确理解，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动力、领导、前途等根本问题的正确理解的一个总的科学结论。在这个总的结论中，已包含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两阶段的革命发展论的基本原理。中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著作中所包含的另一重要思想。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机会主义者「二次革命论」严格区别开来，「二次革命论」者认为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两者之间是没有任何历史联系的。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民主革命成功后，建立起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即不革命的时期，以发展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有了大的发展，工人阶级人数增多，同时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工人阶级利用资产阶级的若干民主，使自己的组织才能有了提高，然后再由工人阶级领导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很显然地，这完全是十八——十九世纪

欧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的廉价的贩卖，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同时，也就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孟什维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整个看法。他们完全忽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世界革命史上以及对中国革命所引起的重大变化，因而他们不能把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当作一个革命过程中的两个阶段来了解，而是孤立地观察中国革命，孤立地观察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机械般用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套，这就是「二次革命论」——中国孟什维主义者在思想方法上反唯物辩证法的实质。

当然，在这时，毛泽东同志还没有作出中国革命已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结论。但我们却可以清楚看出，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中，已包含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几乎全部的基本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只不过是这些思想的补充和发展而已。我们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新民主主义论」这两个伟大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思想发展的历史联系，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著作中所闪烁着的思想光芒，已预示着毛泽东同志迟早要做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全部结论的。

(四)

然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我们的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终究还是年幼的党」，「是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国的历史知识与社会知识都不懂得或不丰富的党，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间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共产党人」发刊词）这种情况，就使得陈独秀等具有机会主义思想的分子，有可能利用一般党员群众在理论上的这种落后性，而窃据着党的主要领导地位，并从多方压抑、排斥、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

自觉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在党内的传佈，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伟大著作，就是由于陈独秀的反对，当时不能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更不要说由党中央把它在全党加以推广和介绍了。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后来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綱领性的著作中所提出的策略原则，当时没有为全党所认识，所接受，而陈独秀等孟什维主义思想随着革命形势的进展，终于发展成为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就成为后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主观原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然是失败了，这当然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一次很大的不幸。但这种历史的失败，正如陈伯达同志在「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只是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理更加坚定示移罢了。」同时，有了这样一条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这就使党获得了生长的基础，因而终于能够战胜一切机会主义，渡过各种险恶的风浪，而达到胜利的彼岸。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伟大著作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所作的经典性的说明，以及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独立阐发的工人阶级政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中的策略原则，不仅对我们中国今天的革命斗争还具有着实际的指导意义，而且无疑地，它将永远成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庫中的典范文献之一，而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各被压迫民族所欢迎和珍视。有些幼稚的人（要不然就是别有用心），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还没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在当时还不是成熟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显而易见，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于历史的事实的，因而也都是错误的，应该加以驳斥的。

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陈伯达

(一九四三年春天，在延安参加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时的习作)

在这篇文章里，事实反映得这样生动，热情表现得这样洋溢，每个句子，直到每个字，都渗透着对于革命和劳动人民之无限量的欢喜，对于反革命和吃人的剥削者之不可调和的仇恨。

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农民与封建势力的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内容。当毛泽东同志写这个报告的时候，恰是革命的实际运动把农民这个问题最突出最迫切地放在革命议事日程的前面，有如共产国际七次扩大会议决议所说：『土地问题开始紧急起来，成为现在局面的中心问题。那个阶级能够毅然抓住这个问题而给以彻底的答复，这个阶级就是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这报告中就是以无产阶级代表者的资格彻底地答复了这个革命中心问题（在当时又是最迫切的问题）。但是，这至篇报告，不仅明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扫清了许多人们头脑中的混乱，表示了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真正的领袖，而且由此提出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一般的革命根本问题，并根据群众斗争的经验加以概括，作为当时至党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总方向。

(一) 两种方法论

当群众的学生，集中群众斗争的经验及其意见，反过来，又当群众的先生——这是毛泽东同志从来所应用的革命方法论。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应用这个革命方法论的最出色的典型之一。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